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悠远博大的历史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善于透过具体的文字把握抽象的精神内涵，穿过多变的句子挖掘不变的思想情怀。强烈的历史情怀，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一个鲜明特点。一种悠远博大的历史情结，一种宏大叙事的历史观，贯穿讲话精神始终。

□ 张显球

历史是最基本的哲学观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分析历史、揭示规律、启迪未来，是贯穿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一条核心逻辑主线。讲话篇幅的前四分之一，基本都是围绕历史展开的，一直到引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主题思想。这种大篇幅的对党的历史贡献的客观回顾、对历史经验的精炼总结、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使整篇讲话建立在一种丰富确凿、充实生动、宏大充盈的历史基石之上，产生着一种无可辩驳、无法质疑、无比自信的思想力量。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党史研究的理论观点，无一不是从大历史框架下分析提炼得出的。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三个“深刻改变”，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三个“伟大历史贡献”，以及9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给我们的启迪（三个“历史告诉我们”），等等。

从历史中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贯穿于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一种基本哲学方法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乃至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都是总书记关切的对象，并且这些历史发展的规律又反过来成为总书记分析考察客观世界的方法和钥匙。

历史是最不能忘记的初心

谈到9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总书记指出：“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突出历史的重要性，强调尊史，明确历史的“不能忘却”和“不能否定”，进而将全党同志的心灵引领到历史的开端，也就是“初始之地”，是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核心思想。那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我们不管走到哪里，走得多累、多远、多久，都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自己的出发地是人民群众，不能忘记艰苦奋斗这条党性深处最根本的底色，不能忘记为人民全心全意服务的根本宗旨，不能忘记随时随地拒腐防变、奋发图强、公而忘私；相反，忘掉历史，忘记初心，丢掉出发时的理想，就会丢掉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丢掉精神之钙，让灵魂迷失于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荒漠。

历史是最原始的动力

“95年前，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但前途又是多么的渺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想到积贫积弱的95年前，又目睹已经幡然自信开启复兴之路的95年后的今天，面对对比如此强烈、反差如此悬殊的历史和现实，全党正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军。这种从历史的深重苦难中破茧而出的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复兴意识，释放出一种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生生不息的力量，是总书记讲话的一条思想主线。

早在2012年11月29日，总书记上任伊始，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用了三句诗词分别形容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这三句跨越时空的诗词，深刻地诠释着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只有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民族，才会真正懂得复兴的涵义；也只有一个曾经历经过深重苦难的民族，才会对复兴有着如此深切的渴望。

历史是最深刻的自信

自信，是贯穿讲话始终的一个重要主题词，而且，这种自信深深地植根于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历史的深切理解和热爱。在讲话的引言部分，总书记以“历史还告诉我们”为首句，一连讲了三个“长期坚持、永不动摇”，充分体现出总书记对党和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的强烈自信情怀，既有对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充分自信，也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充分自信，还有对当前国家发展战略的充分自信。在正文部分，总书记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极大地提升了“自信”的广度和深度，并且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进一步向全世界宣誓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同样来源于厚重而沧桑的历史：“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总书记将5000多年来的传统文化、95年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高度，这种自信的力度、高度、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敬畏历史的高阔视野、炽热浓烈的赤子情怀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总书记的这种源于历史的自信情怀，体现在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之中。总书记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5000年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历史是最紧迫的事业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这实际上是总书记曾经多次讲过的“梦在前方、路在脚下”的又一诠释。历史的道路上充满艰辛，荆棘丛生，机遇稍纵即逝，要创造历史，要成就伟业，要实现梦想，就不能犹豫，不能观望，不能懈怠，不能软弱，而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干，去跋山涉水，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这是总书记对9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进行深刻研究后得出的又一重要结论。据此，总书记在讲话中还语重心长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总书记在讲话结尾处对屈子名句的引用，更是彰显了总书记在厚重、苍茫、凝练的大历史情怀之下的忧患意识、政治担当、奋斗精神和顽强意志。

司马光的批评

□ 张晓政

唐德宗之怠

贞元四年（788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德宗外出长安城打猎，偶然来到一个叫赵光奇的乡民家里。显然，这是一个展现领导亲民爱民作风的好机会。唐德宗和颜悦色地询问赵光奇：“百姓乐乎？”皇帝问老百姓还高兴吗？潜台词当然也就是问对国家、对皇帝还满意吗？

唐德宗之所以这么问，是有底气的。因为这一年天下丰稔，是近年来未有之盛况。由于粮食大收，朝廷甚至下令在丰收地区实行和籴政策。所谓和籴，也叫平籴，系战国时期李悝所创，即在粮食丰收时，为防止谷贱伤农，由官府平价购入粮食，留待荒年卖出，以平衡粮价、赈济灾民。后世的常平仓、义仓，包括我们今天的保护价收购粮食，都源于此。想来此时的唐德宗，正满心欢喜地等待赵光奇说一些皇恩浩荡、今上圣明之类的话吧？

不想赵光奇却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回答：“不乐。”

事情无疑超出了唐德宗的预料，尴尬的唐德宗只好继续问：“今岁颇为丰收，百姓为何不乐？”赵光奇说：“国家政令已失去了信誉！之前实行两税法，说两税之外再无其他赋税徭役，但现在两税之外的征收已远超过两税本身。如今粮食丰收了就说要和籴，但实际上就是强取，老百姓一个钱都没见到。还有，一开始说官家购粮只需在道旁交纳，后来又让我们送往京西行营，路程动辄数百里，车摧马毙，百姓破产难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朝廷每次颁发诏书都说要优恤百姓，徒空文耳！圣主深居九重，怕是对这些情况皆未知之也！”

赵光奇这一番话很有意思。从他的回答里看不出他是否清楚唐德宗的身份。也许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一番直言不讳、义愤填膺的言语。也许知道，可能随行的人员早已提示过他，但他依然不为所动，冒着“触龙鳞”的风险，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也或许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但他从唐德宗一行人的排场隐约猜出这至少是一位“大官”，却佯作不知情，无所顾忌地把一腔愤懑倾泻而出。总之，这可以说是一位奇人，也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录这段对话时，郑重地写上赵光奇这么一位平民百姓的名字，使这个普通的小人物在青史上得以留名。

那么，唐德宗听了赵光奇的话，又是什么反应呢？史书没有记载，只是说，“上命复其家”，下令免除了赵光奇的赋税徭役。

显然，赵光奇的一番直言一定是让唐德宗大不快意，但又不能不有所回应，于是下令免除其赋役，匆匆结束了这一次谈话。可能在他心中，这也不失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既平息了眼前这个农户的怒火，又显示了自己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的大度。

然而，唐德宗的回应却让这段历史的记录者司马光大为不满。和赵光奇一样，司马光也毫不客气地表示了自己的批评：“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司马光接着解释：自古以来，人们所忧虑者，一是人君之泽壅塞不能下达，二是小民之情郁结无法上通。正是由于上下之间缺乏通道，才会有人君勤恤于上而百姓并不感念，百姓愁怨于下而人君毫不知情，最终导致国家离叛、百姓危亡。如今唐德宗好不容易因为游猎无意间来到农家，又遇上赵光奇既敢言且知民生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听了赵光奇的批评，唐德宗原本应当严肃查处相关部门搁置诏书隐瞒圣意、残虐下民、横征赋敛、盗匿公财的情况，至于左右亲近遮蔽下情、阿谀谄媚、“日称民间丰乐者”，还应当查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衿困苦、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也”！然而，唐德宗放着这些不做，却只满足于免除赵光奇一家赋役。司马光感叹：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岂能人人都有机会自言于天子而户户都得以免除赋役？也因此，唐德宗所谓的关心百姓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资治通鉴》煌煌300余万言，记录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16朝1362年的历史，可以说，进入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每一起事件，都经过了司马光用心的选取。特别是在全书叙事之外，司马光还撷取了前人史论97条，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条，以此表达其对于历史与现实、治乱与兴衰、治国与修身的思索。唐德宗与赵光奇这段对话，虽然简短，司马光却用了更长的篇幅来评论，也说明在他心中，这一“小事件”的“大意义”。

魏孝文帝之疏

其实，类似的情景在书中其他地方还出现过。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在从平城到洛阳的途中，见到不少残疾流离者，孝文帝当即下令停车，自己亲自下车慰劳，并要求对这些人给予衣食抚养终身。按说，这也是一桩亲民爱民的美事，然而司马光对此同样表达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说：人主和国家的关系，“譬犹一身”，远与近、朝与野都是相通的，但凡一国之内的事情，都应当在人主视野之中，因此才必须“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先王治政，还要堵住耳朵、蒙住双眼，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只听到近处的声音、只看见眼前的东西，从而将视听及于更远的地方。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固然没错，但更应有的做法是命令相关部门将这一政策施于全国，使全国残疾流离者都能够受到恩惠。司马光最后同样感叹：孝文帝被认为是“魏之贤君”，况且如此，可见治国理政之不易啊。

大德与小惠之辩

司马光对孝文帝与唐德宗的批评，实质意思都是相同的。首先，需要指出，司马光并不是否定孝文帝慰劳残疾流离者、唐德宗免除赵光奇赋役的行为，他所强调的是，人君治国，不应满足于小恩小惠的施舍，而应顾大局、明大理、行大德。换言之，与其解决一两个问题，不如思考为何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其关心一两个人，不如思考如何使政策惠及更多人群。毕竟，作为一国之君，他们的职责在于制定政策并督促官员落实，使全国百姓都能得惠，这才是真正的仁爱所在、仁政所在。

大德与小惠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在孔子论管仲、孟子论子产中就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形成了大德重于小惠的观念。又由于君主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经世治国显然更重于小惠悦人，正如诸葛亮所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因此，以史为鉴，借助前代事例强调君主这一职责使命，自然也成了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的重要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孝文帝与唐德宗前后两处、相隔遥远的叙事中一再阐发这个道理的原因。

应当看到，司马光关于大德与小惠的评论，其时空背景与我们今天已有很大不同。如前所说，由于君主在古代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即所谓简在帝心、断在宸中，大政方针全由皇帝乾纲独决；同时，由于通讯、交通手段的限制以及为维护君权的神秘色彩，君主“深居九重”，也无法通过频繁的巡视出行亲自解决民生问题，因此，依靠制定政策以及选贤任能确保政令推行就成了君主治国理政最主要的方式。从这个角度上，大德无疑比小惠更为重要。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一方面，领导干部固然需要通过细节小事树立勤政务实、亲民为民的形象，消除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感，这也是实践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政策的普惠使群众都能得益、都能受惠，仍然是承担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责的领导干部所必须重视的。事实上，从孝文帝与唐德宗只见小惠不及大德的事例中，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批评确实是有所指、有道理的，也确实值得后人深思。

史镜

性情校长 马君武

□ 游宇明

马君武是民国时代的大才子之一。他本是留洋的工学博士，却能写一手漂亮的诗歌，是南社的重要诗人。他精通英、日、德、法等国文字，一生译著甚丰，所涉领域十分广泛。他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朱经武曾说：“凡是校内功课，没有一门他不能教的。”

世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有才，为人却遭人非议，然而，马君武不同，他的德性足以与其才学相匹配。

马君武做广西大学校长时，广西军阀白崇禧搞“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某次，白崇禧又在大会上吹嘘自己的这一套，马君武看不惯，当即反唇相讥：“广西无棉花，靠什么织布，没有布，拿什么自给？”白崇禧对他恨之入骨，立即实施报复。他先是对广西大学的学生组织突击考试，想以政绩不佳为借口，将马君武赶下台，没想到马君武办校有方，学生们成绩不错。一计未成，白崇禧决定改组学校，由省府主席兼任校长，马君武是个对官位不那么在乎的人，他只要求担任理工学院院长，以施展自己的抱负，白崇禧仍不同意，马君武掉转身子就离开了广西。直到三年后的1939年，广西大学改为国立，蒋介石任命马君武为广西大学校长，他才得以重掌故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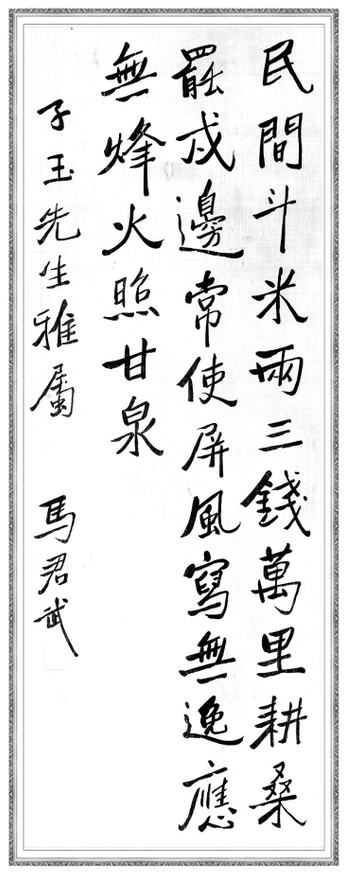
马君武生活极其俭朴。他平时总是穿着蓝布衣布鞋，有些衣服还打着补丁。吃得也很节省，一般都是一荤一素，一条小小的鱼也要分两天吃。做省长时，接待法国领事，只上一杯清茶，连香烟也不备。六十大寿，广西大学不少同事、学生亲往祝寿，可马君武根本没设酒席，中午只是招待了每人一碗面。在北京任司法总长时，住的是养蜂街道一座小小的四合院，这座房子离司法部很远，极其矮小，家中陈设也非常简单。有人劝他改善一下，他坚决不同意。

民国时代，军阀混战，官员贪污受贿是家常便饭。有的权势人物光是老婆就娶了40个，靠他吃饭的多达数百人，其收入来自何处可想而知。马君武虽然多次身居管钱管粮的位置，却以清廉出名。1934年访欧，马君武向德国商行订购一批贵重教学仪器，代理人李某问他想要多少回扣，马君武立即拉长了脸，他要求商家将回扣款纳入货款，多买了几件仪器。他做校长时只给自己定了两百元月薪，是所有教授里最低的。将自己工资定得很低还不算，连同校工作的儿子也受牵连。一样资历，别人工资160元，他的儿子只有120元。儿子大怒，找他理论，马君武说：广西罗致人才不易，应优惠外省人才。1940年，马君武因病逝世，遗产居然只有六千港币。

马君武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放弃抵抗，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全境。闻知这个消息，马君武悲愤难忍，他在1931年11月20日《时事新报》发表了《哀沈阳》两首诗。诗不长，抄录如后。其一：“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其二：“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这两诗所述本事与客观事实有些出入。张学良虽然从小认识朱五（朱湄筠），但两人从无亲密关系；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胡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说张学良事变那晚与两人共舞并不真实。然而，马君武弥漫于诗中的爱国激情却是不能否定的，也是它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原因。

一个人的性情、操守，往往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马君武也不例外。1881年，他出生于广西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县衙做幕宾，生活虽然清苦，倒也较为安宁。不料，九岁时父亲去世，一家五口全赖母亲帮缝纫店绞边、为鞭炮店插引子过活，其困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亲戚伸出援手，他根本不会有读书的机会。经历过这样的苦难，马君武变得格外节俭、克己，为人处事也少有大户子弟的那种圆滑与世故。

马君武很早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1903年，他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艺化学系，不久即参加留日学生反清运动。1905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委会，马君武与黄兴、陈天华等人共同起草同盟会章程，并于8月成为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被选为同盟会书记部书记长兼广西支部长，还担任《民报》主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君武出任《民立报》主笔，呼吁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马君武参与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与别人一起起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后来，窃取元首高位的袁世凯背叛革命，他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出任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1921年又任广西省长。1922年辞去政职，专注于高等教育事业，相继担任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广西大学、中国公学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马君武兼任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为经历过创业的艰难，马君武自然珍惜自己的每一个职务，总想对国家少取多予。



人物志